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四三期 ——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5c)

【抗拒遗忘】	时隐时现的文革历史	余 华
【亡灵祭坛】	文革的自杀等于他杀	顾 土
【不堪回首】	“文革非正常死亡者”刍议	胡鹏池
【各抒己见】	对主流文革史写法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中)	老 田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二十七)	孙怒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抗拒遗忘】

时隐时现的文革历史

• 余 华 •

1970年，安徽固镇的张红兵只有16岁，那时的中国正在经历黑暗的文革时期，他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这一年的一次家庭内部辩论中，母亲方忠谋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张红兵和父亲立刻去检举了方忠谋的反革命言论，方忠谋当天就被抓走。

张红兵仍记得母亲被前来抓捕的人用绳子紧紧捆住时，肩关节发出喀喀的声音。两个月以后，母亲以反革命罪被枪决。

1980年，也就是毛泽东去世暨文革结束的第四年，方忠谋被平反，当地法院认定文革时的判决“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在此后的岁月里，张红兵和父亲一直小心翼翼回避谈及这件事情。直到父亲离休后才第一次和张红兵谈起此事，父亲说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2013年，中国媒体报道了59岁的张红兵的悔恨。张红兵说自己多年来时常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他很多次梦见母亲，他说：“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为什么张红兵的梦境里母亲方忠谋从来不和他说话？我觉得方忠谋不是要惩罚儿子，方忠谋知道这不是儿子和丈夫的错误，而是当时执政者的错误。她在等待来自执政者的真诚道歉，她和所有文革中含冤而死的亡灵一起在等待，她已经等了44年。

最近几年，一些人因为在文革期间以革命的名义伤害过别人，开始通过媒体和网络向受害者道歉。这些忏悔者都已经退休，他们这么做，一方面是不能原谅自己在那个反人性时代里所犯下的错误，另一方面是对近几年出现的肯定文革的声音感到不安。所以，他们站出来讲述自己在文革中的恶行，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了解这段可怕的历史。可是这些忏悔者的声音是微弱的，在充斥着国际危机、国内事件和娱乐体育新闻的网络上，这些声音总是转瞬即逝。

与这些有良知的忏悔者不同，共产党总是能够轻松原谅自己执政64年中犯下的错误，而且努力抹去这些错误留在历史上的痕迹。文革结束的最初几年里，中国社会出现过强大的批判文革的声浪，但当执政者意识到这样的批判已经影响到自身的权威时，很快将其压制下去，仿佛没有发生过。

因此官方的话语里没有真实的文革历史，它只在民间的话语里时隐时现。

现在不少经历过文革的人，在面对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腐败丛生、杀人抢劫、吸毒贩毒、拐卖人口、占用耕地和强拆房子等等丑恶现实之时，气愤和无奈之后开始期望回到文革时代。因为在那个毛泽东的独裁时代，政权高压之下没有这么普遍的社会问题和这么尖锐的社会矛盾。

由于官方长期以来对反思文革思潮的压制，文革之后出生的人不知道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前年6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的毕业生集体身穿文革时期红卫兵服装在校园里拍摄毕业照。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文革似乎是一场娱乐大派对。精明的商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开始借助文革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去年8月，我在杭州的机场高速公路上看到文革式的巨大广告牌，一个LED照明广告，一个女红卫兵伸出双手喊道：同志们，我来啦！

钓鱼岛争端激发了中国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日情绪。2012年9月，中国50多个城市出现反日游行，日系车和日式餐厅被砸，日企被烧。与此同时，大量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在中国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浙江横店拍摄。有个笑话说：中国最大的抗日战场不是淞沪会战和长沙会战，而是横店影视拍摄基地，那里被杀死的日本鬼子已经超过现有日本人口。

日本政府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让中国人感到愤怒，中国政府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也应该反省。我们一直警告日本，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侵略历史，那么日本就有可能重蹈覆辙。我们也应该警告自己，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文革历史，我们也有可能重蹈覆辙。

今天的中国，肯定文革并且希望返回到文革时代的人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其中大多数并不是真正愿意回去，他们中间不少人因为不满现实开始期望一场革命。当然，他们期望革命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一部分人是出于对中国社会越来越唯利是图的不满，更多的人是出于对这三十年来官商勾结形成的利益集团的愤怒。即使在否定文革的人中间，也因为对现实的不满流行起了这样一个观念：文革的错误只是发动时间上的错误，文革应该在今天发动。

□ 原载《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4 年 04 月 10 日

~~~~~  
【亡灵祭坛】

文革的自杀等于他杀

• 顾 土 •

如今，40多年前的卞仲耘校长之死能再次引起人们的反省、争论、辩驳，这说明文革在中国人心里的阴影是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抹去的。卞仲耘校长是他杀，他杀在文革中是一股风潮，有的死在群众的棍棒下，有的死在专政机关的枪口下，有的死于两派武斗，有的死得不明不白。在文革中，自尽也是一股浪潮，席卷全国。那时的自尽，既不像陈天华，也不似王国维，连阮玲玉式的自杀都不属于。其实都是他杀，因为是逼不得已，实在走投无路。

◇ 他们被逼自杀

说起自尽，我深有感触，因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段岁月里，我几乎每天遇见一起。

1966年6月，我去北京工人体育场游泳池游泳，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馆顶一跃而下，摔在我的面前。他好象生前特意穿上整齐的中山装，然后以死明志。我惊恐地盯着他的尸体，他的左脸贴在地面，压着一滩血迹，两条腿呈扭曲状。

我父亲带我和弟弟去北京东直门外放鸭子，那时出了东直门就是一片水塘，我独自赶着鸭子往芦苇深处走，不料，一具尸体浮在眼前，脑袋肿胀得奇大无比，皮肤被水泡得惨白。

自尽，最后还轮到了我的亲人。1966年9月中旬，我在父亲的抽屉内发现了一封发自上海嘉定县公安局的电报，称我的祖母9月8日在嘉定娄塘镇一池塘自尽，遇难时还不到60岁。谁知到了八十年代初，嘉定县检察院和法院又怀疑这是一起他杀事件，理由是我祖母从北京带回嘉定老家的一笔钱无影无踪，另外，她投河为什么不选择附近的一条深深河流，却偏偏去了路途稍远的浅浅池塘？

我当时知道的各类自尽，最难忘的还有这样几位。

邻居蒋荫恩伯伯，他家住二层，我家住一层。那时他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副主任，毕业于燕京大学，在美国密苏里大学从事过新闻学研究，曾经是《大公报》的名记者，还先后当过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抗战时期，蒋伯伯的文字激扬，名重一时。八一三淞沪抵抗，他坐车东奔西跑，四下采访。车行经大世界时遇上红灯，大家都在那里耐心等待，而天上飞机轰鸣。此时他也不知哪来的预感，忽命司机猛闯红灯，一路狂驶，随后一颗炸弹落下，红绿灯四周的人全部丧生，唯有他们幸免于难。听说了这个故事，我的感慨是，那时的人居然如此遵守交通秩序，战火纷飞之际也不忘红绿灯；蒋伯伯尽管预见了炸弹，却没有预料他会死在自己所向往的时代。1949年10月1日当夜，他从美国毅然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不想，最终等待他的却是不幸，自缢身亡。

同班同学的父亲孙泱，人民大学当时的副校长，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因而被说成是日本特务。他的自尽也很惨烈，因为关押他的地下室内没有任何可供自杀的工具，他就把床单拧成一条，捆在暖气管上，一端套住自己的脖子，可是暖气管道很矮，所以只能使劲向下，自己

勒自己，活生生将自己的一条命勒死。但也有不少记载说他是遭群殴致亡，尸体解剖还发现他腹内空无一物，或许是饿死亦未可知。其实这也正是那时非正常死亡的一种常态，既可能打死后再伪装成自尽；也可能是被打得难以承受，以致自我解决，一死了之；或是饥饿加伤害，导致最终病死。北京师范大学的名教授刘盼遂夫妇就是如此，被发现时他们双双的头部都沉浸在水缸内，于是，有人就推论出他们自行将头沉进水缸以自尽，可另外有人说亲眼见他们不断被毒打，肯定是被打杀后凶手们刻意装扮出一个自尽的现场，蒙混视听。孙泱夫人，也就是我同学的母亲石琦阿姨，相貌和风度特别出众，每次见我叫她，都是淡淡一笑，印象至今不忘，据说她也曾因丈夫的罪名屡遭摧残。孙泱的两位公子极其聪明，我的同班同学孙名文理科俱佳，他的哥哥孙宁，与我同年纪而不同班，一身艺术家气质，老是在那里忧郁地拉着小提琴。他们兄弟俩总给人一种心理负荷极为沉重的感觉，这也难怪，他们的祖父1927年“四一二事变”时被腰斩于上海；他们的父亲死于非命；他们的姑姑孙维世死因不明，只剩下一身的伤痕，而且头部还插进一根钉子。每每回忆起孙氏兄弟，我不能不想起他们的那位祖父孙炳文，若九泉有知，这位中共烈士看见遗下的一对子女死得如此悲惨，会做何感想？

语文系的讲师李尚公自杀的方式恐怕空前绝后，这是我父亲和周围长辈们经常说起的一个故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以后，李尚公将一根通火炉用的通条烧红，然后刺入胸部，其自尽之法可谓惨绝人寰。在那根通条刺进时，他要忍受多大的痛楚，实在难以名状，如果没有天大的悲愤，谁敢选择这样的死法？

#### ◇ 一门悲剧的尚钺

我家的另一位邻居，也是我后来读大学时的系主任尚钺，尽管他一直熬到文革后才去世，但终其一生都与非正常死亡相联系，真是满门悲剧，不忍回想。

有一天，忽然传来尚钺夫人在洗澡间悬梁自尽的消息，她只是历史系的一位教师，燕京大学毕业，为什么会自尽，众人议论纷纷。我记得她平时温和平淡，不料却有如此剧烈的举动。不久，又有长辈来说，尚钺的二儿子在长春被刑讯逼供致死，也有人说是自杀。这个儿子当时在吉林工业大学任教，从小就随父亲参加中共组织的革命活动，以后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再考入清华大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当过一个地方的团委书记，最后落脚于吉林工业大学。文革中他和妻子双双被指为特务，说他们用无线电给敌人发报。尚公子白天站在高台上举着沉重的牌子受批斗，台下有人用大棒猛击他的脚踝，晚间还要继续被工宣队、军宣队严刑审讯，断气以后又说是自杀。文革结束，他被平反，说是冤案，可是怎么死的，凶手是谁，如何处置，却没了下文。

这位冤死的尚公子是尚钺先生的前妻所生。尚先生的前妻和妻舅是中共苏区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一个是妇联主任，一个是区委书记，肃反时都死在苏区政治保卫局的枪口之下，也有说是屠刀的。同时被屠戮的，仅河南罗山就有1500多位有名有姓的中共党员。尚钺和这位前妻育有三子，大儿子死于颠沛流离之中，二儿子，就是吉林工业大学的那位，死于非命，第三个，不知所终。等我读大学时才知道，尚先生出身于河南罗山的名门望族，曾在北京大学英语系读书，是个文学青年，早年的小说《斧背》、《病》很有名，颇受鲁迅的青睐；以后又以历史研究闻名于世，1949年之后因为历史观点不合时宜，一直饱受批判。他1927年加入中共，发动过农民暴动，当过中共满州省委的秘书长，在宁夏发展了当地第一批中共党员，不断因革命被捕，又不断因意见不同而被开除党籍。我想，那样的出身和素养却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一生与悲剧结为因果，恐为注定。

尚先生常年在中学和大学任教，桃李天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金日成。金日成对尚先生念念不忘，生前多次来中国想一见恩师，却不能遂愿，因而生发出无限感慨。师生二人至死不能

重逢，而两国两党还有“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此事耐人寻味。

尚钺先生一门惨剧，其悲哀在于，牺牲的亲人都不是死于敌人之手，而死前连一丝挽救的余地也不存在；可他和孩子尽管也曾被敌人多次逮捕，但都能顺利保释，一次次化险为夷。这也不能不引人深思。

还有一位老太太的自杀，也让我不能忘怀。记得我随着人群冲进那一家的洗澡间后，看见她正躺在浴缸内。她是在洗澡间屋顶的水管上吊的，绳子断后，尸身落在浴缸里。她的胸前挂着一个布袋，人们拿下布袋，发现里面存放有户口簿、粮票、粮本、布票、粮本、工业券和购货本。我听大人们猜测，可能是老太太因为儿子和儿媳都被关押，而她又接到红卫兵遣返原籍的勒令，眼看孙子无人照看，只得以死换回儿子的释放。她临自尽前害怕死后家里混乱时丢失了那些票证，儿孙丧失了生活供给，所以就想了这么一个法子。这个故事后来又被传为，老太太死不瞑目，直到孙子拿到那些票证，她才阖上了双眼。

我生长的那个大院，最早叫铁一号，就是铁狮子胡同一号，后来改为张自忠路三号、工农兵东大街三号、地安门东大街三号，最后又回到张自忠路三号。这个大院那时非正常死亡不断，尤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盖起的三座红楼，洗澡间和厕所上端都有粗粗的水管从明面经过，特别适合悬梁。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少年时代，心理留下很重的阴影。近20多年来，铁一号的那些长辈去世，无论曾经多么熟识，我从不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或追悼会。我不愿意再从那些已经安详的音容去回想一个刻骨铭心的时代，那个自杀的时代、非正常死亡的时代。

如今数起来，我所知道的自杀之法，大概有10几种之多，有的方式，简直闻所未闻，为了踏上不归路，居然能够想出无比惨绝的方式。那时的自杀，都是逼不得已，只要还有一线生机，还剩一丝尊严，谁也不会如此决绝。江青是文革无数自杀的根源之一，但她最后也选取了这样的方式，算是为文革自杀画上了句号。

#### ◇ 从自杀看中国

在我成年以后，周围的自杀就不同了，起码以我的眼光看去，都不属于迫不得已，但照样前仆后继，幼时的伙伴、读书时的同窗、插队时的熟人，纷纷一死了之。自尽的原因被认为是患有抑郁症。

有一位女生，自幼就是我家的邻居，谁曾想，她长大成人后，考大学没考上，直接进了机关，老是认为领导不重视她的意见，最后以自杀博得了领导的另眼相看。还有一位我在人民公社劳动时的熟人，那个时代的积极分子，真心真意地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改革开放后总怀疑四周变“修”了，结果郁郁寡欢，拒绝一切象样的物质生活，最终不得不选择死亡为他眷恋的那个时代殉节。另一位也是我自幼的伙伴和邻居，不知为什么，在他眼中，周围的人越来越像小丑，整个社会活像是个荒诞的舞台，他每天神神道道，常常低着头自言自语，终于以真实的死亡摆脱了荒诞的存在，离开了丑陋的现实。

不过，他们的自尽都已经回到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那几类方式：坠楼跳崖、自缢投水、服毒割腕。前些年发生的富士康自杀连环事件，虽然我不认识死者，可是他们选取的死法，我再熟悉不过了。

抑郁症，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才知道的。过去有没有抑郁症，我未曾调查，不便发言。即使有人内心深处患有此症，恐怕也没有机会发作，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不是批判别人就是被别人批判，忙得不亦乐乎，哪有时间抑郁？或许有人真正的原因确实死于抑郁，但那个

时代这样的死因本身就是罪过，所以，结论无不归于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运动从此走向终止，经过那么多的急风暴雨，全国人民都应该接受心理治疗，无论整人的还是被整的，不管批人的或是被批的，在心理上多多少少都有毛病。可惜，当大家还没有意识这一点时，匆匆忙忙就走进了新时代。其实，即便大家认识到这种心理疾病，也无可奈何，哪来那么多的心理医生啊。不像如今，每一场自然灾害，都会有心理医生奔赴灾区。那时不要说文革，就是唐山大地震，人们也只知道“地地震，人大干”，想都没想过自己还能落下什么心理的病根。文革造成的心理疾病是如何影响文革后的，似乎无人在乎，他们的心理疾病是否又传给了下一代、再下一代，也好像无人关心。或许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有那么多抑郁症患者，有那么多精神病人，还有无数心灵扭曲的人，与文革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自尽，有人以为他们轻生，我倒认为他们重生，正因为他们将生看得很重，所以选择了放弃。选择自尽的方式告别人世，在古今中外才华出众的文艺家之中比较通行，尤其是诗人，似乎自杀才是才华的归宿，或许因为他们比常人更敏感，更重视生命的标准，所以敢于主动面对死亡，坦然而去。

中国的自杀，百年来经过了几大阶段，上个世纪初以陈天华为代表的那批热血青年，愤然一死，为的是唤醒国人；以后的王国维，则是对一种文化的殉情；而阮玲玉，在于她面临的是30年代那种生活矛盾所带来的种种无奈。这样的自杀，应该说，属于人类所共有。但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的自杀，就带有浓重的中国时代特色，人格受到侮辱，环境不断威逼，很多人实在难以苟活，可谓逼不得已。自80年代以后，抑郁症又弥漫全国，造成各色人等不知不觉间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最近数年，宜黄钟家血案那类的自杀原因不时被暴露出来，显示出普遍的深层问题。在这些自杀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

自杀，作为人类生活的归宿之一，古今中外皆然。屈原的自杀，我们奉为节日，延续至今，人人景仰，但对其他的自杀，人们的看法常常不同甚至对立。其实，作为自杀这种结束生命的方式本身是一样的，每个人的结果也都相同。一个人一旦选择了自杀，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需要勇气，我们还是应该怀有敬意的，起码不要侮辱死者，说他们是畏罪，或者自绝于什么的。

研究百年自杀史，可以说，就是在研究百年中国的历史！

□ 原载《共识网》

~~~~~

【不堪回首】

“文革非正常死亡者”刍议

• 胡鹏池 •

◇ 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文革死人，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死于1969年11月12日—13日之间。

其实早在1968年年中，刘已经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了。办公厅的负责人对医护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当然，这样的命令又岂能是办公厅的几个马崽所能下得了的。

你说老头子心中究竟是怎样一种想法？你心心念念要打倒的“头号敌人”快要死了，你就让他死不就得了吗。他呢？早死早超生；你呢？他早死了你也定了心，也好再瞄准下一个敌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你俩也是如今所说的“双赢”了。再说，敌人一死，敌人不就彻底消灭了吗？为什么还非要让他活到“九大”以后？他生不如死，你又有什么愉快的呢？

刘少奇死时，妻子王光美已经身陷囹圄，儿女们自杀的自杀，坐牢的坐牢，没死没关的几个也正在四处逃窜呢，只要有深山好藏，说不定也能变成“白毛女”。总之是没有任何一个亲人在身边，真够得上标准的八个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刘死前的几个月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身边的专案、警卫、医护虽还不老少，可没有一个能出于爱心给他“做卫生”。当然有的医护人员的“爱心”也是有一点的，可又没那个胆。乱杂毛般的头发一尺有余，下颌斑斑血迹，浑身臭不可闻。护士图省心，索性一件衣服也不给他穿。刘就这样一丝不挂，光溜溜的，在一个秋夜的寒风中被装进送尸车，塞进高炉里，旋即冒作了一缕轻烟。

这意境很“美丽”，不由得让人想起徐志摩的那首美丽的诗，不过得改一改：

你轻轻走了，
正如你轻轻地来，
来时没有三角裤，
走时也无人给你穿戴，
一片布帛也不给，
更何况什么红旗、鲜花与云彩。

虽然刘少奇的地位是最高的，但他并不是最惨的。毕竟，他只挨过一两次的批斗、一两次的打，而且还是在中南海。中南海的造反派毕竟也有点素养，也讲点政策，打斗不算很重的。

头号大军阀彭德怀死得比他惨。

彭德怀元帅自从1966年12月13日凌晨被北航红旗从成都劫走，直至1974年11月29日命归黄泉，这期间他被批斗了多少次？已经没人能够说得清。什么飞机式、挂牌子、戴高帽、拳打脚踢，剩粥馊饭，所有这些“现代化”的“核武器”般的手段，他都在“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年岁前后，统统地不止一次地尝了个遍。而且，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落在大学里的造反派手上，这些学生造反派花样精多，“斗争性”强。仅北航红旗那一次30多人的内部小型批斗会，就将他打得前额淌血，遍体鳞伤。北航红旗的头头，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一个人称“小诸葛”的白衣秀士，一个男人叫了女人名字的细长条子的大学生，亲自坐阵指挥了这次批斗会。据说韩爱晶本来也是不准备亲自动手的，只是看着手下人打得痛快，心生痒手发痒，也走上前去打了彭德怀一记耳光。他的手下人看见他们的头头也动了“杀戒”，势必上去打得越发地欢了。据说那次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打断筋骨两根，究竟有几次是在韩爱晶动手之前，又有几次是在韩爱晶动手之后呢？至今也没有人问这个问题。

又有一次，在北京卫戍区小礼堂批斗会上，彭德怀已经被斗得精疲力竭、七荤八素的了，

好不容易等来了十几分钟的“课间休息”，却不料被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的李钟奇冲进来一拳打倒在地，还果真被踏上了一只脚。李司令一只脚踩在彭元帅的身上，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伸出去两尺远，作红卫兵般英武状（这种造型，文革宣传画中比比皆是），大声喊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中将则把便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彭的头上，对彭说：“你认识我吗？我就是差点被你枪毙的人！”说着就朝彭左右开弓，狠命打耳光，像敲竹板般一样清脆响亮。

彭德怀最终死于直肠癌，好歹死前进了医院，就算是死在医院里的病床上。所以也就能称之为“不幸因病医治无效”了。

众所公认，文革中死的文臣武将中，还得数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最惨，前后受审数百次，挨打无数次。专案组的人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一边爬楼梯，一边舔面条。每打一次，都要打得昏死过去，然后再由医生将他弄醒了，接着再打。打人的人都有点技术，虽打得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人被打得站不住了，就将他按在椅上再打。有一次，一个粗壮汉子亮起中华杰出武功“飞毛腿”，一腿就将许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起来扔回椅子上再打，直打得许大将口中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1969年5月23日，已报病危，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泽东的像请罪！三天后，许光达大将惨死在马桶上！

这是说的元首、元勋们的死法，平民百姓的死法更惨。

张志新在狱中，无数次被轮奸，终于精神失常，用月经血蘸馒头吃，押送刑场前又害怕她喊反革命口号，干脆将她的喉管割了。

李九莲刑前，也是怕她喊反动口号，将其下颚和舌头用竹签串了。在赣州西郊枪杀后，因无人收尸，抛尸荒野。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歹徒奸尸，挖去双乳后从容逃离。这双乳有什么用呢？即使丰满，也是血淋淋的，难道可供手淫？

钟海源是李九莲案的同案犯。押赴刑场前，用给牛马注射的特大针管注射了三剂特种药剂，行刑时对着非关键部位开了一枪，说是“刑毕”。人还活着，被争分夺秒地送上了车篷里的简易手术台，活肾被成功地移植给了一名高级军官的儿子，据说那官崽子也不过多活了十来天。

李九莲未婚，当然也没孩子；钟九莲已婚，有一个三岁的孩子。

十八岁的黎莲，如花似玉，可能连恋爱都没有来得及谈。她的死法与钟洪源异曲同工，也是被活体取肾的。但她没有打针，也没有用其它任何麻醉药，只用手术刀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医生手法圆活，没几下子，一个滴著殷红鲜血的肾，就泼刺刺、泼刺刺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一个老干部正等着呢。也不知道那个老王八又苟活了多少天？

刘少奇惨，彭德怀比刘少奇更惨，许光达又比彭德怀还要惨；张志新惨，李九莲比张志新更惨，黎莲钟海源比李九莲还要惨。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痛不痛，想想大将与老总；惨不惨，比比黎莲李九莲。

还有没有更惨的？当然有，有的是，斩草除根、断子绝孙，就是另一种惨法。文革中全家死光光，灭门绝户的也不知有多少家。

要问这是为什么呀？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惨？这样惨？呼儿嗨哟！呼儿黑哟！

李九莲、钟海源被毙时，老人家死了一年多了，“四人帮”也早已打倒了，那时的中国大地唱：“交城的山呀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

◇ 有人怕痛，有人不怕！

“文革自杀者”们一旦决定了自杀，自然明白这是这一辈子所能创作的最后一件“作品”了，谁都想将这最后一件“作品”创作得“漂亮”些，利落些，甚至“愉快”些。而这主要取决于“自杀方式”的选择。

选择“自杀方式”首先要根据客观条件，以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能上”的可行性。例如家中有足量安眠药存量，那就服安眠药；没有安眠药，有敌敌畏也行；家中有管道煤气或液化气，那就选煤气中毒；住高楼的选择跳楼……

其次就是“预后”。要考虑死亡的速度，过程中的痛苦程度以及心理上的恐惧等等。

比如“跳楼”。这种方式的“预后”是脑浆并裂、断手断脚、粉身碎骨——太恐怖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都希望“全尸”，零部件一个也不能少，当然就不会采用了。像电影演员上官云珠、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总参谋长罗瑞卿——选择跳楼，那也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其它选择的余地。

又比如“服毒”。服毒后至死亡前这一段时间内有五脏六腑的绞痛及七窍流血的预后。自杀者一般对此也是十分恐惧，当然也不会采用了。

自杀是对人世最终的诀别，一旦离开了这个世界，即使过了一万年再回来一分钟看看也不行。这世上既有“红烧肉”与“中国豆腐”这样舌尖上的美味让人留恋，更有父母妻儿的亲情让人犹豫，所以一般的“自杀者”都会想出一些办法来增强自杀的决心，增加自杀的勇敢，同时减轻自杀的痛苦。最常见、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喝酒，俗话说“酒壮怂人胆”。让酒精先将自己麻木了，然后再将毒药喝下去。

据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原本就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对蚯蚓、蛇这类动物害怕到了“闻风丧胆”的程度，他就是采用“喝酒”这种办法来为自己壮胆的，他喝了一瓶茅台酒后再上吊。

著名的赫哲族作家乌·白辛（原名吴宇洪），也是这样做的。

1966年9月的一天，白辛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受到很大的震动。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但他已经被江青点了名。这位昔日上海滩上的二、三流演员在文革初的一次讲话中一下子疯狂地枪毙了成百部电影，她说：“《冰山上的来客》作者乌·白辛是伪满州国人员”。白辛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了，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背靠着这根树干，吃着喝着死着。

没有人知道白辛死前的痛苦究竟到什么程度？也没人知道酒精的缓冲作用有多大，反正在他被发现时，已经死多时了。

白辛所采用的方法比田家英有“诗意”，他利用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拥抱了大自然的美丽。

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于1966年9月6日与夫人程卓如副教授决定自杀，他们家里既有安眠药也有煤气罐，但安眠药的数量远远不够，所以这夫妻俩先各自服了几片安眠药，然后再打开煤气罐，双管齐下，既能减轻痛苦，又能确保成功率。

作家白辛与音乐家杨嘉仁夫妻显然害怕自杀过程中的痛苦，但也有一些自杀者是不怕的。

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就是这样的人。

韩俊卿在文革初期经受了无数次批斗，游街，脖颈上挂着“假权威”、“假劳模”的大牌子。虽然痛不欲生，但也忍了；虽然已有死的念头，但也想再等等再看看，蝼蚁尚且偷生，好死不如歹活，能熬得过去就尽量地熬着吧。

然而，她没有能熬过去。有一天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造反派批斗她时，当众逼迫她脱下鞋袜。而她在小时候受尽苦难，缠过小脚。

年轻的读者们，你们见过女人的小脚吗？笔者毕竟上了一把年纪，小时候见过外婆的小脚，还见过邻居兰姑娘、曾家老太太……的小脚。小脚女人在穿着鞋袜站着时有亭亭玉立之感，走路时有弱柳扶风之姿，一旦脱了鞋袜，那小脚不但惨不忍睹，而且奇臭无比。

韩俊卿的小脚是她心灵深处永远的痛，所以她的鞋袜是万万不肯脱的。这一脱，她那双畸形而丑陋的小脚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狗男狗女七嘴八舌，有人说好看，有人说难看，有人说臭；有人说脸是麻子，脚是小脚（她小时候得过天花，确是个麻子），太难看了。字字句句都是剜心的刀子。造反派还不罢休，又逼她那双光着的小脚在煤渣路上“走两步”。就像赵本山么喝范伟“走两步”。范伟“走两步”，就瘸了；韩俊卿“走两步”，从批斗现场一回到家里，就立刻自杀了。

她没有安眠药，但有敌敌畏。在决定“死”的瞬间，韩女士所考虑的内容与白辛先生大不一样。她没有考虑用什么方法去减缓死亡过程中的痛苦，而是只求快死、速死、万无一失地死。为了预防万一死不了或是死不快，她还是争分夺秒地搞好了一包火柴头，喝了敌敌畏后，立刻就将这一包火柴头咽了下去。让火柴头在体内燃烧。她的文化程度很低，她不知道“火柴”燃烧的要素中必须要有氧气。

韩俊卿的故事是另一种“悲惨决绝”，在这个故事里有两点有关“人性”的问题需要思考：

一、造反派的人性：

你说这些造反派，斗也斗了，打也打了，为什么还别出心裁地要她当众脱鞋脱袜，露出那双畸形而丑陋的小脚呢？三寸金莲？年青的造反派们没有见过，所以他们有好奇。这就是人性中一种“窥私”的阴暗心理。“严凤英之死”的故事里，那个畜生军代表刘万泉下令对严凤英的尸体“开膛破肚、砍尿泡”，就是“窥私”心理的极致发展，由“窥私”而“窥裸”而“窥阴”。

二、韩俊卿的人性：

韩俊卿在决定自杀后想的是什么？她难道没有想过喝“敌敌畏”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吗？这是常识，她当然是知道的。但是她当时大脑的兴奋点并不在这里，所以她也没有想如何减轻痛苦？更不会采取任何减轻痛苦的措施；她的“兴奋点”是如何迅速死，确保死。她对“活”

的恐惧远远胜过了对“死”的恐惧，再痛再苦，只要早死就好，她一分一秒也不想再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她非但没有找酒喝，相反还吃下一包火柴头。即使在数以万计的“自杀者”中，韩俊卿也算是一个“一不怕痛，二不怕死”的典型了。再痛也不怕，就怕不得死。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人性”啊？

这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让生灵对活着的恐惧竟到如此的程度！

人性如何坠暗夜？人性如何坠暗夜？人性如何坠暗夜？

暗夜恹地浓无边！暗夜恹地浓无边！暗夜恹地浓无边！

◇ 狠角色！最狠的角色！

文革自杀者，有的人在死前是会刻意保护家人的；有的人则只图自己死，全然不顾家人了；有的人则将家人拖着一起死。这种将家人拖着一起死的人心肠真是不一般地“狠”啊！都是一些“狠角色”，其中则有一名“最狠的角色”！

先说说著名诗人闻捷吧。他是以“红色诗人”闻名于世的，文革前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在渡过了文革初期的艰难岁月后获得“解放”，不久调到上海。上海是“四人帮”老巢，那里的阶级斗争比别处更激烈。闻捷又与张春桥素有嫌隙，在上海工作不久即遭张春桥诬陷、打击。他恨透了张春桥与姚文元，巴不得他们早日下台，但眼看张与胖子姚受到毛江的青睐，官却越做越大了。闻的夫人杜芳梅是陕北米脂人，米脂是中国一个著名的生产美女的地方，杜出身望族，大家闺秀，美丽、端庄、贤慧、热情，她与闻捷是一对典型的才子佳人。但她比他死得还要早，是跳楼自杀的。一般说来也是“受迫害”，但具体的死因一清楚。

杜芳梅自杀后，上海作协革委会派了一名造反派头头来到闻捷所在的“五七干校”通知他消息，这个人就是戴厚英。戴厚英有一个外号“小钢炮”，可见这是一个性格多么张扬的女人，时任上海作协革委会的第四把手，兼任闻捷调查组组长〔注1〕。她在与闻接触的过程中竟然由同情而爱慕，不久就投怀入抱了。戴时年30岁，比闻捷小15岁，两人申请正式结婚遭到组织上的拒绝，张春桥称其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工宣队则采取各种手段强行拆散这对恋人。

1970年12月30日下午，“五七干校”召开了对闻捷的批判会。闻捷在会上不但不作检查，相反却称对“小钢炮”的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由此被上纲上线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与反扑，有人甚至说闻捷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批判大会后，闻捷终于意识到这段感情的无望无助，不得不与戴断绝关系。处于政治前途无望及个人感情失落中的闻捷于1971年1月10日在上海家中，打开煤气自了余生。

闻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去了吉林，闻捷就带着小女儿赵咏梅在上海凄惨度日〔注2〕。如今他决定死了，孩子怎么办？他虽然顾不上孩子了，却不想让孩子一起死。所以在开煤气之前先把通往小女儿房间的门窗都小心翼翼地糊好了。

闻的孩子最终活了下来。

顾圣婴，著名女钢琴家，上海市交响乐团独奏演员，1957年获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金奖，以后多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

文革不久，顾即遭批斗。到1967年1月，对她的揭发、批判又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她被勒令下跪认罪，这如花似玉的老姑娘又被一精壮的男子狠狠抽了一个耳光，当晚即1967年1月31日开煤气自杀，死时只有30岁。

顾圣婴死前与闻捷的想法不一样，她自己不想活了，也不想让家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顾很清楚自己活不下去，留下老母与弱弟也是无法活下去的，还不如让他们与自己一起死了算了。不过，她的母亲和弟弟都是成年人，如果真想活的话，那也是不可能听从她摆布的。很可能是顾圣婴将这个问题一摆到桌面上，老母与弱弟就同意了，全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自觉自愿地与她一齐死。

自杀是天大的事，平常日子，家中如若有人想不开，家人发现苗头，都要百般劝说并严加防范的。但文革时期，家中有人想自杀却很容易引起共鸣，你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不如大家一起死算了。这种高度一致的协议很容易就达成了，这也叫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啊！文革中有无数夫妻、家人一起赴死的例子。比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妻，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妻等等都是夫唱妻随，共赴黄泉路。如同“斜风细雨双飞燕”般，是另一种美学人生的意境。

顾家三口人就这样一起死了，但这个家庭却还没有死绝。顾的父亲顾高地戏剧性地成为“漏网之鱼”。因为他因潘汉年案早就一直在青海服刑，家中发生的一切，老顾头毫不知情。文革后，潘案昭雪平反，老顾头也被平反了，以老病之躯回到上海家中，人去楼空，孑孓遗立，泪水不知掉了几缸子。老顾头落实政策后被聘为市政府参事，有一份薪水，看病吃药没有问题，一直活到1990年10月。顾高地死后，这个家庭才彻底被消灭了。

前几年笔者曾无意中看到《作家文摘》上有一幅顾高地和妻子秦慎仪、女儿顾圣婴、儿子顾握奇的全家福，尽管是报纸上的黑白照，但仍然可以看出这一家四口个个都那么夺目的美丽、似乎也很阳光，很温馨的样子，却想不到照片背后的人生却是那么地悲惨。真是感叹！

唉！顾圣婴啊，你再坚持坚持该有多好！

有一个中学教师叫薛寿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可能是1959届。他的父亲是右派，所以寿虎在校时就已经光荣地成为学生右派了。薛寿虎虽然当了右派，但他所在的那个组织上考虑到他是一个老实人，右派言论也不严重，认罪的态度又好，所以仍然被分在上海北郊中学当教师。中文系毕业的不让教语文，改行教教体育这类不涉及思想的课目。薛长得英俊，也很有才华，美术很好，学校里的宣传画、美术字就都由他包办了。他的太太是上海护士学校毕业（中专），分到贵州，不习惯当地生活，擅自回上海丢了工作。在与右派崽子薛寿虎结婚后，又生了两个小右派崽子，都十分天真可爱，长得也很漂亮。这时马鞍山煤矿到上海来招工，薛妻愿意去，薛也愿意去，报名时却隐瞒了右派分子的身份。薛妻先到马鞍山工作后，在办薛的调动时，马鞍山方面发现薛原来是个右派，就连他妻子一并退回了。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

偌大的中国，七、八亿的人口，一个人想隐瞒一下自己的身世，跑到一个没有熟人的新地方去开始新生活，哪还不容易吗？嘿！在那个时代就根本做不到。有户口、粮油计划、档案等好几个“粪袋子”随着你呢，如影随形，跑到哪儿跟到哪儿。所以那个时代的人，无论是“阶级敌人”还是“阶级好人”，可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盲流”这个名字不好听，可在那个年代，基本上就没有“盲流”。“盲流”是改革开放后的新名词，那个年代除了极少数的“反革命流窜犯”，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的“盲流”啊！老人家曾自豪地说：“六亿人口，全管着呢！”你说他的本领大不大？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歌颂它“威力无比”、“光焰无际”呢？就是它能够处处地方全都照到了。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光”是不会拐弯的，可毛泽东思想的那个“光”特殊，能拐弯，没有它照不到的地方。

薛寿虎回到上海后只好仍在北郊中学继续教体育，全家仅靠他56元工资生活。他身体好，爱人小孩也没有病，夫妻感情甚笃，其家族也无自杀病例。“穷”当然是必然的，“苦”也是必然的，好歹也能活。

但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就那么厉害，你不招它，它会来招你。1967年下半年，薛寿虎被工宣队大会点名，（注3）说他至今还没有一张大字报，上窜下跳，是扒手式人物。薛自知难逃批斗，上午点名后，中午回家，用毯子堵好门缝，打开煤气，与其妻与两个儿子一起自杀了。

薛本人自杀也就罢了，薛妻决定与他丈夫一齐自杀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让两个4岁、6岁的儿子一起死呢？虎毒不食子，闻捷死时不是保护了他的孩子吗？

那是各人的具体情况和心境不一样。薛父是右派，薛当右派的主要原因是“遗传性”。“右派”这个“政治麻疯病”在老薛家已经传了两代了，薛决计不让它传到第三代，于是自己动手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这种心情比当年的太监“自宫”还要心狠一百倍啊。

顾圣婴心肠比闻捷狠，薛寿虎又比顾圣婴心肠狠，有没有人比薛寿虎的心肠还要狠？有啊！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郭兴福，南京军区步校教员，“郭兴福教学法”的创立者。

文革前，郭兴福的名头与雷锋差不多一样响。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当年自从开始学雷锋后，全军雷锋式的英雄人物就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雷锋不是雷锋一个人，而是一嘟噜一嘟噜，一串又一串，有王杰、刘英俊、欧阳海、门合、麦贤得、李文忠、蔡永祥、廖初江——报纸上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一个，他们的事迹越来越精彩，他们的学习毛著的心得体会全都如同现在的音乐“串烧”一般，好听而美妙。比如有一则李文忠（或门合）的“四个一切”的“串烧”：“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听从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一切保卫毛主席”，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八亿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得为他老人家一个人活着。

在所有这些英雄人物中，郭兴福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他的出道似乎比雷锋还要早，他的事迹也不是“学毛著、做好事”的那一种，而是以“军训”成绩闻名全军。著名的“郭兴福教学法”直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64年、65年时罗瑞卿搞的全军“大比武”也与他有直接的关系。

文革一开始，曾经大红大紫的郭兴福就遭殃了。因为他是叶剑英、罗瑞卿、李德生发现培养的，文革中理所当然的成为黑标兵、假标兵、罗瑞卿的黑爪牙。

南京是全国著名的三大火炉城市，在夏天40度的高温下，造反派们让郭兴福手拿一把草，口衔几根草，连续不断地在水泥地上爬，每爬一步都要高声喊一喊：“我叫郭兴福，我是铁老保，保皇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

有一天下午5点钟，郭兴福被准许回家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他对妻子李淑珍说：“你要是愿意，咱们一块死。”妻子说：“我愿意。”接着这两口子讨论了孩子的问题，得出一致的结论：“孩子不能留下。吃饭穿衣都不会，谁照管？再说反革命的孩子也没个政治地位，不会有好日子过的。留下是让他们活受罪。”

1969年1月29日晚，郭兴福用刀子和绳子杀死了3个无辜可爱的孩子，妻子抱着郭兴福哭着说：“让我先死吧，我死了你才能死啊！”于是郭兴福用小刀子割断了妻子的手腕和太阳穴的静脉血管，看着鲜血喷了出来。郭兴福也切开了自己手腕的血管，两人就一齐“死”过去了……

可是不久，妻子先从昏迷中醒来了，一看孩子死了，丈夫也死了，自己却还没有死，于是她带着血迹爬到窗口跳了楼。

此时，郭兴福也醒了。他一看自己没死成，就拧碎了灯泡，吞下灯头，强大的电流将他击倒在桌子上。这一回他断定自己死成了，但他发现仍然没有死。这个脾气暴烈的山东人彻底愤怒了：老天爷啊！你既然不让活，为什么还不让死呢？他扶着桌子站起来，碰到了桌子上的一把剪刀，顺手剪去了左边的一只睾丸，又顺手扔出了窗外，……郭兴福还是没有死。他想烧死自己，他把脚搁到电炉上，棉裤烧着了，一想，不能连累左邻右舍，又一把拽断了电线。他想看看妻子死了没有，妻子却不见了。正在这时，他听到了楼下救护车的铃声，听到了上楼的混乱的脚步声。坏了，坏了，再不死死不成了。郭兴福潜意识中这样想，于是跌跌撞撞走进厨房，抓起菜刀，又往自己身上连砍十几刀。

鲜血流了一屋子，老郭却仍然没有死成功，死神存心与老郭过不去。

这个过程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已经不够了，所好中国人还有一个“惨绝人寰”的词。

郭兴福啊郭兴福！不能再说“没有最，只有更”，这个郭兴福就是“文革自杀者”最狠的角色，他的凶残、曲折的自杀事迹能上“迪尼斯”世界纪录。

三个孩子死了，两夫妻居然没死成。老天爷将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老郭获救后被判死刑，最终获平反，夫妻俩带着噩梦般的回忆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1985年8月的一天上午9点多钟，郭兴福骑了一辆旧自行车上街购物，一辆大卡车从他身后开过来。那个驾驶员有16年驾龄，年年都是安全驾驶标兵，车速也仅10公里多一点，仅比一个人走路的速度快了那么一小点，但却将老郭从脚压到头，当场毙命。（注4）

这也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年迫害郭的人固然人性泯灭，但郭杀子杀妻、其过程其手段更是人性丧尽。

闻捷自杀时尚能顾及到女儿，我的底线也只能接受到这种程度了。

薛寿虎夫妻将两个小孩一起自杀，我已经不能接受。所好是开煤气，过程似乎轻飘飘。

像郭兴福那样亲手杀死三个孩子再杀妻，我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一想起他连续杀孩子的情景，一直心惊肉跳不已。他的心太黑、手太狠了。若这种人换个角色去整人，一定也是兽性的。我不了解什么“郭兴福教学法”，估计也离不开“不忘阶级仇，牢记民族恨”，还有什么“三从一大”之类的玩意儿。

诅咒那个时代，但同情不了郭兴福。

注释：

〔注1〕许多资料都说戴厚英是闻捷调查组的组长，但戴在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说她只是组员，她不是党员，不可能当组长。

〔注2〕在网上看到的资料说闻捷的三个女儿都去了东北。但笔者很多年前看到的资料却谈到闻捷在开煤气自杀前，刻意糊上了通往女儿房间的门窗。现在一时也没找到出处。

笔者分析：闻捷有三个女儿，两个大的去了东北，上海家中留下的是小女儿赵咏梅。这个分析得到证实，在陈德宏《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杨文林诗文集”读后》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文革”中闻捷被打成“反革命”，关“牛棚”进干校，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许多人避之惟恐不及，而杨文林却利用出差路过上海的机会，前去看望闻捷——这正是闻捷含冤死去的前一天。患难见真情。没有见到闻捷，成为杨文林终生的遗憾，但“却深深地记住了他生于兰州、母亲已含冤去世的孤零零的小女儿赵咏梅一双透着茫然的、怯生生目光的眼睛。这是一种难忘的悲情，使我牵思30年……”（《陇头水泊·后记》）

杨文林：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副主席。甘肃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

〔注3〕“1967年下半年，薛寿虎被工宣队大会点名”，这是原始资料上的文字。笔者对此有怀疑，因为67年下半年，还没有“工宣队”这种形式吧。

〔注4〕：参考朱继忠《轰动全国的郭兴福案始末》来源：今晚报

□ 原载《共识网》

~~~~~

【各抒己见】

对主流文革史写法的知识社会学分析（中）

• 老 田 •

〔上接zk1405a〕

二、政治迫害与文革派性政治的关系

就武汉的文革过程而言，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数确实非常多。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受迫害”是从属于文革派和反文革派政治博弈目标的，双方受迫害人数的多寡与力量对比成反比，因为反文革派力量比较大，所以是造反派受迫害的人数比较多。

从政治上“受迫害”情况看，那些把自己的优势地位视为当然的派别，更加不兼容对立派政治利益。反文革派的派性大于文革派的派性，换句话说，当权派和保守派对于造反派的政治利益的不兼容程度是最高的，这个强势派别有一种“朕即国家、老子代表党”的优越心态，批评我就是“反党”。在造反派内部则是“老造反派”对于“新造反派”的政治利益兼容程度较差，这其实也与反文革派的不兼容程度高有内在一致性：老造反把造反时间早、冒着政治风险起来批判“资反路线”视为一种资本，有没有“资本”作为一种标准，就成为一种选拔或者排斥的不兼容心态，这是一种“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优势心态。

文革期间的派性政治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兼容别派的合法政治利益，而且在派性政治的

背景下，那些为“派性斗争”添砖加瓦的人士往往较快地获得话语权和领导权，这成为派性政治难于解决的一大死结：任何为削减派性对立作出努力的人士在派别内部，都有可能被扣上“右倾投降”“老机”的帽子迅速边缘化。在这样的派性政治逻辑中间，很小的分歧往往发展为势不两立的争斗，对于革委会席位的最大化愿望总是无法通过协商解决，最后总是发展到一派把另外一派打成反革命为止；武汉一月夺权之后的“香花派”和“毒草派”的对立，七二〇事件之后的“钢新之争”，都是这样一种基于革委会席位的派别斗争。

在1966年8月和1968年清队运动期间，确实也有许多“非文革派”受迫害现象，前期主要是“反文革派”为了转移运动方向所致，这种政治迫害行为是最为堕落的，迫害造反派多少还体现为一种政治追求，而西纠在北京发出第三号第七号通令，把所谓的“黑五类”家庭赶出北京城则是完全毫无必要地伤害无辜。

除了文革时期特殊的政治博弈带来的政治迫害之外，干部中间长期存在的山头问题和宗派问题也一样在文革期间起作用，文革初期抛出干部中间的弱势群体以及与高层官员有矛盾的官员，就是这种常规权力斗争的体现。成立革委会之后，军队干部揪住党政干部的各种问题不放，导致解放干部的政策长期不能落实，也是这样一种山头主义逻辑起作用的。

在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造反派内部派别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争夺革委会的席位：要在最大化本派席位的同时最小化别派的席位。为了实现席位竞争的目的，妖魔化别派头头的行为大行其道，武汉两派之前没有重大矛盾，派别冲突就是从席位竞争开始。最开始是“工造总司”说“工人总部”和“二司”的头头“修”了，这导致“工总”和“二司”撰写了《二八声明》进行反击，反过来说“工造总司”是“半途杀出来的投机商”，“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看不到人，夺权的时候就跑出来了，是“摘桃子”的。对于《二八声明》的不同态度，导致“香花派”和“毒草派”的对立，在军队支左后，毒草派中间的造反派一样受压，这样，才又与二司联合起来组织“抗暴指挥部”，但是，直到七二〇事件前夕，毒草派仍然坚持“工总”头头是“牛字号”（即牛鬼蛇神），只同意“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

派性的存在和持续发酵，妨碍了对立派之间建立起互信机制，结果又诱发新的政治上的不兼容，导致各级革委会的难产，甚至革委会建立之后也很难确立必要的工作权威。在不兼容对立派政治利益的情况下，实际上没有办法建立起互信机制，最终又诱发了一种类似于“预防性战争”性质的顽固派性，这种派性的心态是：“我可以不掌权但是绝对不能让你们掌权，你们一掌权我们就可能要挨整”。为了降低自己“挨整”的政治风险，所以，要预先采取行动不让对方掌权，既然目的是不让对立派掌权，就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反对对立派的头头乃至对立派推举参加“三结合”的干部代表。一方面是为了本派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让对方的强势人物掌权，昆明两大派“八派”和“炮派”的表现最为典型，双方都竭力丑化对方支持的“亮相干部”：炮派支持的赵建民被八派说成是“叛徒”，而八派支持的秦基伟则被炮派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秦的太太是重庆资本家的女儿）。由于这两个人身上都富集了对立派赋予过多政治反对能量，中央在考虑云南革委会人选的时候，只好不选这两个人。派性的存在成为文革期间最为重要的“现实”，为了规避派性可能带来的问题，中央在作出政治选择时充满了各种策略和权宜之计，而无法按照事实或者政策来作出最佳选择，这无疑加剧了当事人的不满，秦基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间的不满程度甚至还超过被指斥为叛徒的赵建民，毕竟赵建民支持炮派是违背中央要求的，但秦基伟却是按照中央要求支持八派最后一样没有用他。

派性政治的逻辑在文革期间有着充分的表现，最后实际上成为推动文革运动走向的一大动力。在文革期间各个派别内部，始终存在着大量的积极分子去为派性能量最大化而添砖加瓦，最后使得任何派性斗争只要一开始，就会自动地在各派内部积极分子的推动下迅速最大化，最终完全没有办法解决。清华两派的分裂从1967年4月份开始，文斗了一年多，到1968



年终于走向“百日武斗”，许多师生逃离清华校园。双方争辩的实质，被李仕林等人概括为“两派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伪装成路线斗争的派性斗争”。（16）无序的政治竞争在这个著名的高等学府制造出一个真正的“霍布斯丛林”，最后不得不派出工宣队、军宣队去履行“利维坦”角色。积极参与制造“霍布斯丛林”的人，就这样把自己淘汰出局了。

在武汉的八轮镇压和六轮反抗中间，按照加害人和受害人身份，各种政治迫害事件可以粗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反文革派”迫害“文革派”，占据至少70%的比例，这类迫害数量最大，其中清查北决扬、五一六运动打出反革命分子约40万人（造反派数字，张体学估计数字为60万人），此外文革初期工作组“抓右派”“打反革命”，1968年“清队”运动期间都有造反派受到迫害，不过数量要少得多，在几千数量级。

第二类迫害事件属于反文革派迫害非文革派，这大约占25%的数字，1966年8月省市市委决策，并由中学保守派组织“特别行动委员会”（其头头是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实施的抄家、破四旧运动，受害人数万。在1968年“清队运动期间”，也有一批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受到打击，高校老教师在这个期间受迫害的现象特别严重（因为这些人大多数是解放前完成高等教育出身多属于剥削阶级家庭），这也有上千这个数量级。西安的“红色恐怖队”和北京的“西纠”打击“黑五类”就是这个性质的迫害事件，而武汉和其他地方打击“黑五类”的做法是受了北京“西纠”通令的影响。

第三类是“反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占大约4%，这是干部里面的山头主义在文革期间发作的结果。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曾经公开讲过“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军队干部掌权时期设立了很多秘密的专案审查这一大批干部，只有有一点点问题就揪住不放，使得干部解放问题长时间得不到顺利解决，有一个湖北日报的老记者曾经与文革前市委书记宋侃夫“监护”在一起，老记者问宋书记怎么看文革，宋回答说：造反派群众喊“打倒宋侃夫”都是假的，不起作用，只是毛主席要群众起来批评批评干部而已，要是毛主席要打倒我们那就真的倒了，我相信主席不会这么办的，不过，要是那些穿军装的人铁心要打倒，那就真的起不来了。（17）宋侃夫的这个说法是符合革委会成立之后的事实的，当时主要是军队干部掌权并决定如何审查和解放干部的。

第四类是大约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反文革派”，一月夺权之后“批斗老干部”，全市性和单位内部的批判，合计发生过几千起；七二〇事件之后“揪斗”老干部和“百万雄师”坏头头，也有上千起，还有上千名“百万雄师”坏头头被扭送各个派出所。这些被扭送的坏头头，几天之后因为没有人管只好释放出来，此外，还有中学生造反派报复打死保守派的恶性案例，全市大约5—6起。受过造反派批斗的高级干部，到了文革后一个人出一本回忆录，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很多人读到这些回忆并由此形成自己对文革的印象。但是，受迫害最严重的群体，出版回忆录的机会非常少（造反派在国内出版回忆录的极少，目前只见过一例，黑龙江范正美的《秋梦追思》）。其实老干部群体在文革期间的遭际，只是文革政治迫害事件的极小比例，受迫害的程度也相对较轻，过于依赖这种回忆录来认识文革，有可能极大地低估文革政治迫害的严重程度，对文革期间对立派别的派性和政治不兼容问题也会认识不足。

第五类占大约不到0.5%是文革派迫害文革派，这是造反派内部的派性竞争引起的，武汉的钢派和新派组织之间曾经发生过武斗，最严重的是1968年5月3日“新中原武斗”，死伤十数人。

全国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致与武汉的情况接近。

在各种政治迫害中间，清查北决扬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时最为恶劣的，受害人数最多，持续时间很长，遗留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这个清查运动之所以特别恶劣，关键在于要把事实上不存在的五一六问题制造成为一个打击造反派的借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投入海量的人力物力进行“逼供信”，实现以“口供”定罪的目的。为了打出上千万的反革命分子，文革初期那种依靠积极分子的方法就不够了，这个时候开始引入“脱产”的专案组成员，武汉称之为“动力”，南京叫做“小分队”，每一个重点审查对象往往要投入好几个完全脱产“动力”（多数动力都是保守派成员），这样才能保证多数专案人员对单个审查对象的体力和精力优势，轮流对审查对象进行逼供。这个持续数年的“清查”运动虽然实现了把造反派彻底整下去的目标，但是极大地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

还有两种“干部丧失权力”情况，与通常的政治迫害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涉及到的干部的绝大多数。一是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各省市地县政权实际上“作废”了，绝大多数干部因此丧失了权力和地位，这个原因不在于造反派或者其他的什么人，而是毛泽东针对干部“罢工”的局势所下的决策——通过三结合的方式重新建立各级政权。此后新成立的各级革委会实际不承认从前的政权，革委会选用的官员数量不足从前党委和政府官员总数的20%，这才导致大量“剩余”干部下干校。二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通过一个人直接点名的方式，把那些镇压造反派最积极的军队干部指为“林彪死党”，那些整人比较热切的军队干部则指为“活党”“上了林彪贼船”的人，其中一些人也丧失权力甚至被关押起来，这一次涉及的高官数量也有几十人；然后就是“权归政，兵归营”，结束军队支左，大批军队干部退出革委会返回军营。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十五军军长（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都被指为“上了贼船”，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省革委会副主任）被指为“死党”关押秦城监狱十年，河南军区的王新、成都军区梁兴初也同样被指为“死党”。这一次“死党”的待遇比刘少奇还差，刘还有专案组审查他的历史问题。这一次被指明为“死党”，连审查的程序都没有，我后来访问刘丰的儿子，他告诉我说刘丰被抓进“秦城监狱”关了十年，没有一个人来理他，出狱之后按照正师职待遇安置在江汉油田。

“一月夺权”之后重新建立各级政权的重大步骤，触动了当权派群体的根本利益，最大化了官员的不满，谭震林和陈毅等人在“二月逆流”中间说文革小组某些人和造反派“想要打倒整个老干部”，实际上是指桑骂槐，通过这种方式发泄对毛泽东本人的不满，把各级政权作废的决策，跟文革小组成员没有关系，跟文革小组支持的基层造反派也没有关系，而是毛泽东一个人针对干部罢工的形势作出的决策。革委会成立之后，机构极度精简导致对干部的需求过低，致使文革十年期间滞留干校或者赋闲的干部数量过大，得到“任职机会”而“解放”的干部数量只是少部分。从这个历史背景出发，很多干部写书说自己“被打倒”，这不是事实，但是“丧失权力并参加体力劳动”则是真实的。与今天的网络词汇“剩女”一样，文革期间机构精简带来大量的“剩官”。

1971年周总理告诉斯诺，文革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有六万多人。现在大约有一万人。”周总理还告诉斯诺：剩余的干部被送去五七干校，去干校并不是惩罚，而是一种例行的政治疗法。（18）这意味着中央政府级别，有80%以上的干部丧失了权力地位。武汉市革委会成立之初只结合了96名干部，后来又陆续调入一些，合计也不超过从前的20%。为了安置这些“多余”的干部，多在农村兴办“五七干校”，然后要求没有“结合”的干部下放劳动。除了多余的干部之外，在职干部按照当时的要求也要轮流下干校劳动，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也一样下过江西的干校并在干校里结婚生子。

此外，文革期间高校等文教机构，实际上有一段时间停办或者停止业务，在1969年形势紧张时期进行过“战备疏散”，这些机构的成员，也一样下到各地农村的干校里搞体力劳动，

例如费孝通就曾经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旧址兴办的五七干校呆过一段，文化部下属一些机构则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兴办了五七干校，钱钟书等大家都在那里呆过。很多人写回忆录说自己“进牛棚”，其中少数人确实因为政治原因受到批判和管制，但多数人只是下干校干过体力劳动，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牵扯。

（未完待续）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二十七）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4 0 5 a，第八章 留校任教但文革仍在继续（1968.10—1980.10））

第八节 四五天安门广场，中国人真实心声的呐喊

应了合久必分的老话。清查五一六运动以后，由几个教研组合并而成的大控制教研组经调整又拆分成了几个小教研组。我们教研组换了一个名称，叫微电机教研组。1974年秋，招收了一届工农兵学员。这是我们教研组在文革中唯一的一次招生，再招生是在文革结束以后的事情了。自控系在文革中更名为电子系，文革后又更名为计算机系，我们教研组的专业方向也改为声音图像模式识别。

新招生的这个班叫微4班，三十几名学生。因为教研组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所以上上下下都非常重视。

文革中的教学模式与文革前大不一样。文革前的基础课都是由各基础课教研组分派老师到各班授课，有些是几个班合在一起上大课。现在，教数学、物理、英语、机械制图等基础课老师下放到各专业教研组里，与教专业课的老师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教学组，统一负责这一个班的教学。这样的教学组织很类似于火车的包乘组，既有列车员，也有乘警、广播员、炊事员等等。我作为专业课老师也参加了微4班的教学及管理工作。

因为文革耽误了大好青春的工农兵学员好不容易争得了一次上大学的机会，绝大多数来清华上学都渴望好好学点知识。但是，党给他们的光荣任务不只是上大学，而是“上、管、改”，阶级斗争是他们的一门主课。批林批孔，反击右倾回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运动一个连着一个。工农兵大学生被当枪使，扮演着我们曾经扮演过的“炮灰”角色。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师想教也教不了许多东西，他们想学也没学到多少东西。

有一段时间，我曾风闻要把我调到“梁效”写作班子去。自从迟群、谢静宜把持清华、北大的大权以后，他们把两校的笔杆子组织起来，起笔名“梁效”，专门炮制两校教育革命的“经验”推销到全国。“梁效”在外的名声很不好听。即使是在清华，老师们私底下议论起“梁效”来，也是嗤之以鼻。我深知它不得人心、恶名远播。所以，一听到这个风声，担心极了。到时候去还是不去，都是两难的事情。我心里想：想当年老子连《新华社》都没去，还去你这个破地方？万幸的是，这传闻最终只是一阵风，这一劫没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想，很可能，还是我的政治条件不合他们的要求吧？互不满意，正好！

自从工宣队进校以后，特别是迟群、谢静宜独揽清华大权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关怀下，清华出尽了风头。我常见到迟群在主席台上，挺着胸、昂着头、背着手，冬天的时候披着军大衣，趾高气扬地一副将军的模样。他专横霸道有时是无赖撒泼的作风让刘冰等党委班子都无法正常工作。于是通过邓小平向上“参了一本”。这告状信被毛泽东批为“矛头是对着我的”，由此引发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刘冰等四位告状者，随即被打倒在地。

那段时间，老师们都听到了一则传闻，说清华在社会上的名声很臭，有人要来冲击清华。于是，我看到主楼广场西南角的简易校门（当时称东南校门）增加了校卫力量。还听说，一旦有人来冲击，就要组织师生员工在校门口筑成“人墙”来保卫清华。

我一听到这则传闻，心里又不安了。我巴不得社会上有人来冲击清华，杀杀迟群的嚣张气焰，但是又怕这样的“人墙”要面对流血冲突。让我打人我不敢，要是被人打了又冤枉。如何是好？幸好，又是一场虚惊。

当时的政治气候诡谲多变、风声鹤唳，不知道哪天会出什么样的大事。

1976年1月8日，一个惊天噩耗传遍了神州大地：周总理与世长辞了！

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是周恩来在文革中苦撑着危局。他与其说是病死的，倒不如说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如果说，对毛泽东，人们是像对神一样的敬畏着，那么对周恩来，人们就像是对擎天之柱那样又敬又亲的一种感情。

而对414来说，对我来说，则更多了一份别人少有的情感。尽管414已经远去了，一直把周恩来作为414精神后台的我们，那时对他依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和爱戴。

说句老实话，后来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时候，虽也有点伤感，但是怎么也哭不出来，哪里有周恩来逝世的时候发自内心的痛彻心腑。

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随着清明节的来临达到高潮。实际上，这种悼念活动已经超越了仅仅是对周恩来的哀思，更多的是发泄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怒，对批邓反击右倾复辟的不满，对十年文革的厌倦，还有对中国前途的深深担忧。

在清华，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受到重重压制的。师生们的悲痛和不满被迫表现为沉默。

4月4日是清明节，这天正好是星期日。这之前，学校里已经通过组织系统下达了通知，要求大家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就在自己的单位里、宿舍里、办公室里就地组织小型的座谈、悼念活动。

这几年来，我的朋友们已经深感文革十年是一场恶梦，对政治斗争已经厌烦。好些人早就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去参加什么政治运动了。我也这样想过、说过。但是，我这人本性难移，到关键时候又有点按耐不住，蠢蠢欲动了。清明这一天，我独自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向天安门广场奔去。

快到天安门广场，远远看去广场上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各式花圈密密麻麻地耸立在人海中。我随手把自行车放在一边，穿过大马路，快步融入到人群中。

满眼都是花圈、挽联、黑纱、白花、标语、诗词。身在其中，久已压抑的心情一下就舒畅

了。我大口大口呼着气吸着气。吸入的气息是新鲜而激动的，呼气的感觉是自由而通畅的。

那些挽联、诗词和标语，大多数都是深切怀念周总理，表达对周总理刻骨铭心的哀思。还有许多是或明或暗讥讽四人帮、期盼邓小平复出的。对这些，大家看了，相视着会心一笑。

人多的地方，有大声朗诵悼文的人，也有站在高处发表演说的人。我恍惚觉得这一幕很像是五四运动的天安门广场。朗诵的、演说的慷慨激昂，听众有的热泪盈眶，有的高声叫好！

有一些人在拍照，更多的人是在抄录。

我到天安门来，一是来表达我的悼念之情，二是来感受广场的实际氛围。到了广场上，看到了那么多在清华根本看不到的诗词、悼文，感受到在清华很难感受到的人心民心，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周总理是永垂不朽的，四人帮是必定要垮台的，这就是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

我没带笔记本。搜遍口袋裤袋，找到了一页纸，看到特别带劲的，就抄录了下来。

清明时节泪纷纷，谁入广场不动情？抬头不见总理面，俯首碑前唤亲人。像这样悼念周总理的诗文不计其数。

我们想念总理，我们怀念杨开慧。这是一条标语，更深的含意谁都明白。

翻案图穷匕首见，攻击总理罪滔天。青江摇桥闪鬼影，反罢河妖红霞现。这首诗文已经不客气地点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大名了。

还有一首这样的诗：北大不大中华大，清华不清八亿清。斩尽妖魔祭英灵，自有革命后来人。我看了深感社会上对这两校已经是何等的鄙视、蔑视了！

一页纸，很快就抄满了。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被四人帮打成反动诗词登上《人民日报》的最为有名的诗文，我只能抄在字里行间。

在人来人往的人群中，我碰到三四个我认识的人。我们只是颌首点头，眨眨眼睛，算是打了个心照不宣的招呼。还有好几个人，他们对我笑笑，但是我并不认识他们。我想，这一定是认识我的清华人，于是我也回上微微的一笑，算是作答。

在群魔乱舞的神州大地上，此时的天安门广场成了一方能自由表达思想的净土。彼此素不相识的人觉得到广场上来的全都是“同志”。连小偷都绝了迹——他们也知道在这个地方行窃是要遭五雷轰顶的！

当天晚上至凌晨，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诗词在一夜之间全都被搬走。“工人纠察队”对广场上的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这一事件震惊海内外。随即，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被定性成“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于是，各单位立即开始清查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有关系的人和事，调查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

为了安全起见，我不得不把抄写诗文的那一页纸销毁了。在销毁之前，我默默念了好几遍，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四人帮倒台以后，我搞到一本内部出版的《革命诗抄》，我抄写的那几首诗全都收录在里面。

在广场上见到过我的人，不管是我认识的还是我不认识的人，没人把我供出来。除了他们这几个人，谁都不知道我曾经去过天安门广场。

后来才知道那天广场上还有不少便衣特务。他们拍照是为了收集证据。我很傻，还以为凡是在广场里的人全都是真心实意来悼念周总理的呢。幸好我只是几十万现场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我只是抄录诗文，并没有发表演说这类引人注目的活动，所以特务的相机镜头没光顾到我。只知道在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横行于市，无孔不入遭人嫌。没想到共产党的天下也是一样的。这使得我多了一点政治常识：可恶的特务，即负有“特殊任务”的走狗是无处不在的！

除了追查直接参与天安门事件的人和事，还要追查政治谣言。追查的任务一级压一级的压下来。追查微4班有没有造谣、传谣、信谣的任务落到我的头上。

我自己也常听到一些所谓的政治谣言，多数都是挖苦、嘲笑四人帮的。每次彼此的传与说，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津津有味。我不仅听过“谣”，碰到信得过的朋友，也传过“谣”。既“输入”，也常常不失真地“输出”。

让我这样一个暗地里去过天安门广场，信谣传谣的老师去追查微4班学生的政治谣言，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我感到很为难，但是又不敢公然违命。

我把学生集中起来，先做了一番动员，说了一些连我自己都不信的鬼话，讲追查政治谣言是如何必要，如何重要，云云。接着把纸发下去，要求大家把听到的、传过的政治谣言统统都写下来。有的学生说从来就没听到什么谣言呀。我说怎么着都得写一点，不写是不行的。我想的是我自己如何交差。

那一刻，我想，学生们心里一定在想：孙老师很像是个四人帮的小爪牙吧？

等到每个学生都上交了，回到宿舍里，我把所有的材料仔细地看了一遍，感叹不已。

有的学生很老实，把听到某某人在某某地方说的“谣言”都写了。可能对他而言，并不是想揭发谁，不过是如实复述而已。

有些材料写得很搞笑，说在上厕所的时候听到隔壁的厕所间里有人在散布小道消息如何如何。还有的说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听旁边的人说如何如何。这样的政治谣言即使再反动也无从追查起。我看了，心里直佩服这些学生真聪明，居然能写得这样有水平！

我全部看了一遍以后，把材料分成两部分。大部分是没有什么分量或者无法查证的，我放在一堆，等着领导向我催要的时候再交上去。还有很少的几份材料，有的分量比较重，有的写得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很容易追查下去的。要是真的送到成心想追查政治谣言以求立功的人手里，会很麻烦的。这几份材料我就塞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里。几十份材料中即使少了这几份，到时候我也有办法搪塞过去的。

好几天过去了，给我布置任务的领导是只布置不检查，没向我要。我也当作遗忘了似的，随他去了。一摞材料如废纸一样躺在我的书架上睡大觉，有好几个月。

那个时候的基层干部，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反感四人帮的。上一级领导布置了任务，不敢不传达不往下布置。要不上级怪罪下来，吃不了兜着走，不是闹着玩儿的。但是，也就是走走形式过过场，没几个人去认真做。连清华这个迟群已经统治了好几年的四人帮据点，广大干部群

众都是这样消极对抗，更何况在其他的单位。四人帮是那样的不得人心，其快速覆灭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九章 清华之后

第一节 公审四人帮，又见蒯大富

1980年10月，我离开了学习、工作了二十年的清华，离开了我特别想离开又有点舍不得离开的清华，调到浙江省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

到新单位以后不久，我看到电视转播公审江青、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对他们的世纪审判是合民心、顺民意、大快人心的，反革命集团主犯的下场也是罪有应得的。从这一政治审判中我得到的信息是：文革的所有罪行，全是由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干的，“伟大”的领袖永远是伟大的。

有一次，我看到以污点证人身份出庭的蒯大富在电视上作证。尽管他被羁押着失去了自由，但看上去依旧很有风采，人也不是那么精瘦了。他侃侃而谈，尽显口才。我想多看几眼阔别多年的蒯大富，只可惜电视上给他的镜头太少了。后来，我听说他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被判刑十七年。（近几年才知道最权威最确切的提法是：蒯大富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点也没有解气、活该的想法。真实的感觉是认为判的理由不足信，判的刑罚过重了！我心里为蒯大富有点不平。

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被提起公诉被判刑的十名主犯中，不是主犯的蒯大富的刑期与吴法宪、李作鹏相当，比邱会作还多判了一年。这合理吗？就算蒯大富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从犯，总没主犯的罪恶大吧？

蒯大富是以“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煽动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案由被提起公诉的。正如蒯大富自我辩护的那样，“如果回到1966年，我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为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连公诉人在那个时候也与蒯大富一样没有看出来，他们怎么有资格对蒯大富提起公诉呢？

我还要说，如果在1966—1968年间，林彪、江青已经形成反革命集团了，那么，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林彪当选为中共副主席，江青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那些提拔林彪江青的，拥护林彪江青的，投票选举林彪江青的所有九大代表们，该当何罪！所谓“明察秋毫高瞻远瞩英明伟大”的领袖又该当何罪？

在文革初期，不要说蒯大富会犯这样的“罪行”，我想每一个造反派头头都可能会犯这样的“罪行”。我要是处于蒯大富的处境和地位，这样的“罪行”也免不了会犯的。当被工作组整成“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的时候，看到中央文革的人来解救自己，看到周恩来亲自给自己平反，看到江青来支持自己，我也一定会听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去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刘少奇。全国的亿万民众，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重判蒯大富可能会让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被造反派整惨了的老干部觉得大快人心。但是，以这样的罪名来定罪是可笑的、不能成立的。蒯大富为自己做的辩护是有理的，站得住脚的。

出于政治需要所做的不公正判决，那是庄严法律的嘲笑，既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也教育不了广大民众和蒯大富本人。四人帮横行的年代是无法无天的年代，审判四人帮的年代依然是法制不健全的年代。今天，据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是权高于法、以权代法、以钱贿法现象比比皆是。

蒯大富有罪吗？在对蒯大富的指控中，还有“杀人罪、诬告陷害罪”这两条罪名。我认为在下列三件大事上，蒯大富是有罪的：

一、蒯大富炮制了“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和“十二人反党集团”案，对抓捕的师生进行惨无人道的逼供信，导致刘承娴老师的死亡和多名老师学生的伤残。虽然蒯大富对专案组的所作所为也有过疑虑，曾指派王良生到专案组所在地200号核查“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交代的“罪行”是否真实可信，并指示不得打人，但是蒯大富作为这些冤案假案的主要策划者和最高领导者仍然是负有罪责的。

二、在两派百日武斗中共有十几名学生和职工死亡。在4。29的武斗中谢晋澄被汽车碾压致死，特别是5。30武斗中团四多名学生丧生在武斗场上以后，蒯大富又决定武力封锁科学馆。如果蒯大富对团派下死命令，绝对不许在非武斗现场开冷枪射414人员，那样，至少朱玉生、杨志军、杨树立、钱萍华等几条鲜活的生命就不会死于非命。我知道在团派核心中有好几个人都是态度极其强硬的激进分子，他们不见得完全肯听蒯大富的约束。但是我更知道，蒯大富在团总部核心中的作用、地位和威信都是无人能及、无人敢撼的。蒯大富如若下死命令，谁擅自开枪杀人谁就抵命去，那是管用的，谁也不敢不听的。所以，蒯大富纵容团派激进分子射杀无辜群众这一条罪责是成立的，极为严重的。

三、七二七工宣队进校的时候，对于手无寸铁，举着红宝书来制止清华武斗的工宣队员开枪、扔手榴弹、扎长矛，导致打死5人，打伤731人。在这一起严重的流血惨案中，蒯大富上午并不在校，回校后决定抵抗。蒯大富作为团派的一把手，下令对工人们采用武力抵抗的强硬对策，从而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蒯大富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

蒯大富在他的辩护词中，对“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辩护铿锵有力，无懈可击。对“杀人罪、诬告陷害罪”的自我辩护，在我看来，都是强词夺理，无理狡辩，站不住脚的。按照蒯大富的自我辩护，在文革中，在革命的名义下杀人放火、抄砸关押都情有可原了，都不算是罪行了。蒯大富当年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在辩护词中没有一句对被害人的谢罪，没有一句表示悔恨和自责的话。但事实是，蒯大富指使、纵容恶行，造成了众多师生、干部、工宣队员的死伤，他是负有主要的、直接的、领导的责任的，是难辞其咎，难洗其罪的。如果以此起诉蒯大富，并据此判刑若干年，我认为蒯大富完全是罪有应得。

蒯大富后来也承认：“要是主要以武斗判我罪的话，我还比较服气。因为事实确实如此，我对这场武斗负有主要责任，我非常后悔，这也是无可奈何，在劫难逃。……我对武斗这个事，对清华武斗中死去的那些人，我再三地忏悔。”蒯大富的谢罪虽然晚了一些，但总比某些有血债的人死不认罪要好得多。我相信他的认罪和忏悔是真诚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文革结束以后，好友见面，总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相比那些死去的同学和老师，相比那些受了重伤早逝的或至今仍被伤痛折磨的同学和老师，我是幸运的。我与蒯大富，在九十年代初的深圳又见面了，彼此再握手，一笑泯恩仇。想起我在1966年10月上“井冈山”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感觉与老蒯的关系相当密切。几十年后，尽管在理智上也知道造成两派恶斗的罪魁祸首并不是蒯大富，蒯大富既是文革打手，是施暴者，也是文革炮灰，是受害者。从这层意思上讲，不应该再计较与他的恩怨。我在心里一直

在说，两派恶斗，如果只是观点上的争吵，要是没有死过人该多好！我们可以再做亲密无间的兄弟。但是现在，我与他中间隔着众多的亡灵，使得在情感上再也无法不存芥蒂地和好如初。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友善相处。我真诚地祝愿他保重身体，写点回忆录，把真实的文革留给后人。这也是一件他能做的好事、善事。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